

## 文学是什么？一种全球性文学话语的兴起

◎ 阿里亚·范尼 张晓雨译<sup>[1]</sup>

**内容提要：**本文论证了文学作为一个概念范畴既非永恒也不普遍。就伊朗和阿富汗而言，文学或 adabiy ā t 的形成是 20 世纪早期协会文化的产物，这种文化引进了定义、理解，以及欣赏文本生产的新方式。20 世纪中前期，文学期刊蓬勃发展。这些新观念在文学期刊的体系之下成为了常规惯例。简而言之，本文对作为一个现代概念的波斯文学走向制度化的历史过程进行了阐释说明。

**关键词：**文学制度化 文学概念 波斯 伊朗 阿富汗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4366 (2021) 01-0042-08

**作者单位：**华盛顿大学近东语言和文明系，美国 华盛顿州 西雅图 98185

**Title:** What Is Literature? The Rise of a Global Literary Discourse

**Abstract:** This essay argues that literature as a conceptual category is not timeless or universal. In the case of Iran and Afghanistan, the formation of literature, or adabiyat, was the outcome of early twentieth-century associational culture that introduced new ways of naming, understanding, and appreciating textual production. These new ideas became conventionalized in the framework of literary journals that flourished in the second quarter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Briefly put, this essay provides an illustrative account for the historical process by which Persian literature, as a modern concept, became institutionalized.

**Keywords:** literary institutionalization, concept of literature, Persian, Iran, Afghanistan

**Author:** Aria Fani,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Near Easter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eattle, State of Washington, USA.

本文概述了文学作为一种民族建构的全球性话语的兴起。文章分析了被称为 *adabiyāt* 的新波斯文学话语的形成,描述其在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的伊朗和阿富汗如何变成一种制度上可考、社会上盛行、文化上权威的话语。文章阐述了 20 世纪早期,伊朗和阿富汗作为两个波斯语社会,是如何被纳入到一种全球性进程中去的(尽管这个进程并不均衡和对称);凭此,文学成为了一个为民族建构服务的文明话语。术语 *adabiyāt* 指代一种特殊的文学话语。它拒绝不言自明的简单翻译,因此本文有意不对其进行翻译,借以引导人们关注这样一个事实:它是在一个特定的文学传统、时期及意识形态背景下创造出来的。文学的概念不能再扮成普世的、超历史的或独立的。几十年来,“文学”一词被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近年来学者们开始对这个术语使用背后的种种假设提出疑问。这样他们就把历史进程、审美的偶然性,以及与制度相关联的种种实践置于前景。所有这些共同构成了作为一种全球现象并具有众多不同区域迭代的文学。

本文参与了一场关于文学作为一种全球性话语的形成的学术对话,着重考察 20 世纪早期 *adabiyāt* 在伊朗和阿富汗兴起的必然性(Fani 114-44)。文章不仅聚焦于 *adabiyāt* 的运作,也关注其演变为一个边界范畴的过程。文章通过作者、作品和文学生产场地追溯这一发展过程。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出现了一批富有学识的学者,他们由文学协会(anjomans)所组织,参与了将 *adabiyāt* 打造成一套民族建构话语的工作。他们融合了文学的不同定义,批判地引进了东方主义的方法论,将波斯文学的手稿变成商业印刷品,带来了一种独特的、以民族为主体的新史学传统。20 世纪早期,伊朗和阿富汗的学者积极投身于欧洲文学知识、浪漫民族主义(romantic nationalism)话语需求(即同一民族,同一语言的理念),以及波斯文学传统的交汇之中。由此,他们开启了一个丰碑式的文化事业,将 *adabiyāt* 与现代欧洲文学概念紧密联系起来。

本文突出了波斯文学文化所特有的概念重组过程,从而与以往那些将非欧洲文学中的现代性视为衍生的研究有所区别。文章考察了一个新文学话语的组成部分是如何被生产、组合及重新排列的,其目的是恢复我们对这期间发展出来的语义和历史特殊性的关注;正是在此过程中,*adabiyāt* 的现代概念产生了。它曾经作为复数名词,表示与 *adab* (一种有关礼仪和行为习惯的人文主义探究话语)相关的各种科学,而现在 *adabiyāt* 变成了文学的特有称谓和一个表示文明成就与文化独特性的专有名词。

本文有意避免重温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伊朗和阿富汗的政治历史。对于晚期恺加王朝、早期巴列维时代的伊朗和穆沙希班统治下的阿富汗,已有大量关于其文化和政治发展的研究;然而,把这些文化发展置于一个全球化背景下的尝试却比较少见;这一做法可能有助于我们把注意力从方法论上的民族主义(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将民族国家视为唯一的分析单位)转移开来,以便在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领域取得更为关键的进展。为此,本文旨在将 *adabiyāt* 的出现置于全球(尽管在此例中仅是英语国家)历史和学术背景下。

通过研究英国的文学概念谱系,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舒姆韦(David Shumway)

和维多森 (Peter Widdowson) 对所有把文学概念视作永恒和普遍的看法提出了质疑。我认同维多森的批评观点, 即虽然文学作为一种现象以不同形式存在于所有传统中, 但它作为一个概念范畴则是与商业印刷文化及浪漫民族主义的兴起相一致的 (26)。在语义层面上, 英语中的 *literature* 一词自 14 世纪末首次进入语言以来经历了一系列变革。同时期, *adabiy ā t* 一词的最古老用法也在波斯语中出现。在 14 世纪的语境中, *literature* 和 *adabiy ā t*, 除了指涉其他领域外, 都表示语言艺术或书本知识, 前者与语言领域相关, 后者与 *adab* 的话语有关。正如基亚 (Mana Kia) 所说, *adab* 意指文学形式和得体的举止; 它指代拥有一套技能的学者 (或 *adib*); 这套技能能被运用于一个从属系统中, 从而将此类学者与更大系统下来自其他区域的学者联系起来。

英国文学文化的文学概念化并非发生于真空中, 而是形成于同希伯来语、阿拉伯语、梵语、土耳其语和波斯语等古典文学传统的接触和交流中。在《巴别塔考古学》(*Archaeology of Babel*) 一书中, 艾哈穆德 (Siraj Dean Ahmed) 认为, 文学作为一个概念范畴的兴起, 与语文学在 18 世纪英属印度的兴起, 以及语文学对于文本性、语言和文化差异的认识论假设是密不可分的。语文学方法声称“语言归属于历史, 而非神的旨意或自然法则; 每种语言都产生于自己的历史; 文学所揭示的历史属于民族” (Ahmed 2)。艾哈穆德认为, 这些观念是在英属印度殖民统治背景下, 欧洲与非欧洲文学传统之间文化交流的产物。

语文学方法的标志之一是认为每个民族都拥有一个独特的谱系; 这个谱系最明显地体现于“语言的历史”中, 其次则是在制度和政治方面体现于本体论民族主义中 (22)。本体论民族主义指涉一种政治话语: 它在任何给定的民族文化中定位某些特征, 并将这些特征构建成内在和永恒的。这种语文学方法有助于具体化一种观点, 即民族是拥有独一无二的文学传统和历史的独特族群。琼斯爵士 (William Jones) 的著作对欧洲语文学的发展贡献巨大, 影响了一种新的文学概念化方式。作为一名英国博学家和语言学家, 琼斯在英属孟加拉接触了波斯语、阿拉伯语和梵语文学文化。他将阿拉伯语的《悬诗》(*Mu allaq ā t*)、哈菲兹的波斯语诗歌和梵语的《沙恭达罗》(*Śakuntal ā*) 等作品翻译成欧洲语言。在他的《论东方民族诗歌》(“*Essay on the Poetry of the Eastern Nations*”) 中, 琼斯写道: “每个民族都有一套独特的意象和表达方式, 这些意象和表达方式因气候、风俗和历史的差异而产生。” (4: 539) 每个民族都为其气候和历史所塑造, 这种观点曾反复出现在不同时期、不同语言和不同地域。正如艾哈穆德所言, 琼斯观点的独到之处在于把语文学作为指出人类间差异的方法 (26)。

作为一名 18 世纪的语言学家和翻译家, 琼斯专注于诗歌、法律和语言间的亲缘关系, “文学”一词并未占据琼斯词汇的中心位置。琼斯作品集的第四卷共六百多页, 其中“文学”仅出现了八次, 上文所提到的有关东方诗歌的文章也包含在内。在此卷中, 琼斯援引了文学的不同含义, 没有一种含义是固定的。他在使用时将其与另一种实体进行区别对比, 比如“文学与科学” (学科上的), “诗歌与文学” (通称上的), 并提到“亚洲文学” (地域上的) 或“古代文学” (时间上的) (Jones, 4: 5, 544, 404, 4)。然而, 文学更古老的一层含义在 18 世纪末仍然存在。1771 年, 琼斯出版了一本《波斯语语法》(*A Grammar of the Persian Language*), 这

是欧洲最早系统化阐述波斯语语法的著作之一。在他的波-英词典中,琼斯选择了learning和literature作为波斯语名词dā neshmandi的对应词。后者是一个复合词,由dā nesh(知识)和后缀mand(表示从事某一职业的人)组成(Jones 2: 276)。同样,在《波斯语言史》(“History of the Persian Language”)中,他将波斯语表述为“文学的一个冷僻分支”,调用了“文学”在书本知识或语言艺术上的含义,而非现代意义上用某种特定语言写作的经典作品(2: 203)。

琼斯在《波斯语言史》中写出了后来公认的文学史体裁。意识到其题材的新颖性,琼斯写道:“确实,我的作品标题似乎为(读者的)担忧提供了合理的理由;从君王史到文字史,从波斯帝国革命到波斯习语的变化,这个过渡显得相当突然。”(2: 409)一种语言可能有它自己的历史;这个历史虽然不是完全独立的,但却是有别于王朝史或政治史的。为了证明这种观点,他给出了如下告诫:“可以说,任何国家语言的重大变化通常都是由政府的变化造成的;因此文学史和国家史几乎是紧密联结的,两者往往可以方便地相互证明和阐释。”(2: 410)他把波斯文学的形成分为两个时期,即“萨珊王朝时期和穆罕默德王朝时期”(2: 304)。琼斯在一个语言发展史与民族历史密不可分的背景中进行研究,并且“对于前者演变的研究揭示了后者的历史真相”(Ahmed 10)。

琼斯的文章聚焦于文化独特性的理念。在所有语言中,他的文章是从现代意义和殖民意义上对波斯文学进行描述,也可以说是第一个描述。修饰词“现代”主要指两种新颖的观点。第一种观点,即语言应被置于其独特的历史中进行研究和理解,而非在以语法和词典学为中心的语言艺术学科(即adabiy ā t的复数和前现代意义)中进行研究和理解。第二种观点是将波斯语概念化为单一民族(即波斯)的历史财产,并产生了语言是“民族精神档案”的说法(Ahmed 2)。琼斯远非个例,他谙熟如杜佩龙(Abraham Hyacinthe Anquetil-Duperron)和阿祖(Siraj al-Din Khan Arzu)等欧洲和亚洲学者的著作,其研究紧随一个范围更大的全球学者圈的步伐。18世纪末,他们各自在不同的语言传统中进行研究,改变了文学、语言和学问的语义域。

上文中,我们借助琼斯的观点勾勒了现代早期英语文学文化中文学概念化的变迁。在《忘记英语!》(Forget English!)中,穆夫蒂(Aamir Mufti)将文学表述为文化映射系统的一部分。该系统产生了一个对世界的新看法,即把世界理解为“文明实体的集合,每个实体都拥有自己文本和/或表现的传统”(20)。穆夫蒂分析了殖民地进行文学生产的权力场所的作用,如位于加尔各答的威廉堡学院(威廉·琼斯的研究地),孟加拉塞兰坡的浸信会,以及位于马德拉斯的圣乔治堡学院(帮助建立了穆夫蒂所称的“东方主义的印度‘课题’”)(116)。工作于这些场所的译者、教师、殖民地官员和地方专家共同创造了某种语文学学科。在东方主义众多的全球和语言的迭代中,或穆夫蒂所谓的“种种东方主义”中,这个学科形成了东方主义在英语中的迭代之一。

对穆夫蒂来说,东方主义或世界文学,总是作为一种“边界制度,一个行动管理系统,而非一套超越边界或无边界的文学关系”来运作的(9)。换句话说,这个边界制度以一种程序化的冲动将某些形式的知识生产标示为合法,使它们在文化系统中得以流动,而其他形式则站在

边界之外。琼斯的《波斯语言史》可以看作是这种文化映射的早期例证，书中论述了波斯语的历史发展，把波斯语与波斯民族的文化状况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将其视为波斯文明的所有物。

穆夫蒂认为文学史这一体裁是文学作为一种文化映射系统的最显著形态之一（131）。布朗（Edward Granville Browne）在1902年至1924年间出版的四卷本《波斯文学史》（*A Literary History of Persia*），在许多方面可以说是琼斯爵士一个多世纪以前提出的历史概念化类型。在一百年的时间里，波斯文学文化主要通过东方学界对波斯文学文本的研究、翻译、评论和批判性创作在欧洲扩展了自己的领域。布朗在序言中提供了他的史学模型参考：格林（John Richard Green）的《英格兰民族简史》（*Shor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 1874）和朱塞兰德（Jean Jules Jusserand）的《英格兰民族文学史》（*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 1894）。布朗从格林和朱塞兰德身上汲取灵感，他们早先曾撰写过英国人的民族主义史。布朗坚持一种民族主义史学，将研究对象限制为一个民族/文明的文学史，而非多个不同民族所共用的跨区域语言。用穆夫蒂的话来说，布朗以“一种本土性的文化状态”来定义波斯人（37）。

对布朗来说，波斯文学作为组合具有多重涵义，他将其理解为“以波斯语为媒介来表达思想的诗人和作家”的集合（viii）。运用相同的语言媒介进行写作将这些作家集聚在同一个民族传统下。布朗认为一个文学传统有其独特的历史，这个历史体现出了他称作波斯的这个独特民族的“民族天分”。和琼斯的时代不同，布朗时代的波斯文学指代一个专业的领域，有运用不同语言，在东方主义的不同迭代下进行研究的全球学者。布朗暗指一个“东方学术”库，并将他的学术读者称作“职业上的东方人”（ix）。他对于文学的理解囊括了“宗教，哲学和科学”著作，而不仅仅是“狭义上的文学领域”（viii）。布朗的限定表明了文学的界限——介于语言艺术的学问和想象性写作经典之间——在20世纪早期仍然处于磋商的状态中。尽管如此，大写的文学，正如布朗所拼写的那样，在19世纪末期确实带有文明成就的意味。

艾伦（Michael Allan）的《世界文学的阴影下》（*In the Shadow of World Literature*）审视了文学作为一个概念范畴的运作方式。对于艾伦来说，文学“取决于一系列的实践、规范和鉴赏力，这些都是将某些文本视为文学，将某些回应方式视作阅读所不可或缺的”（*World Literature* 145）。由此，艾伦将我们对文学的理解从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提出的“以译文或原文流通于其文化源头之外的所有文学作品”（4），转变为一个培养和使用某些阅读实践的跨民族阅读群体。通过远离静态的、理所当然的、框架不变的文学，艾伦分析了如何及为何文学在一个特定的文化（讲阿拉伯语的埃及）及时代（后殖民时代）中变的重要的。

艾伦认为，埃及与殖民知识模式的相遇开启了作为语言艺术的 *ā d ā b* 向作为文学的 *adab* 的转变。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埃及，随着印刷文化、国立学校、师范学院、文学院、出版社和图书馆的出现，各种文学机构在社会上盛行并取得文化权威。在此种框架下，*adab* 开始作为现代文学研究的主题。通过将 *adab* 作为一种“规训的阅读方式”进行分析，艾伦认为我们形成了一种“对于文学的理解，即文学与其说是一种文本的属性，不如说是对于一种规训的考古”（“*How Adab Became Literary*” 176）。例如，在艾伦看来，泽丹（Jurji Zaydān）于

1894 到 1895 年间发表在《新月》(*Al-Hilāl*) 期刊上, 题为《阿拉伯语文学史》(“*Tārīkh ā d ā b al-lughah al-Arabiyyah*”) 的专题文章, 并不是关于阿拉伯文学是什么或不是什么, 而是关于泽丹用什么样的方法将某些文本标记为文学, 以及他如何在特定的语言理论和政治史学中构建阿拉伯文学史的叙事。

艾哈穆德、穆夫蒂和艾伦都在文学的概念范畴中找到了一种认知冲动, 它划定、管理和证实某些知识边界。在艾哈穆德看来, 这些边界包括具体化的文化和政治实践。这些实践通过英属印度的语文学方法对阿拉伯、波斯和梵语文学文化进行概念重建。对穆夫蒂来说, 文学作为一个明确的“边界机制”与英语在 18 世纪作为一种全球性语言的崛起密不可分。他令人信服地展示了, 英语文化领域实际上是如何被“强制流动性”机制与非流动性机制所划定范围的(9)。通过呈现英语文学概念化的非标准性(由此抛却文学作为“单一的世界范围内的存在”), 穆夫蒂请求我们记住, 还有许多其他类型的文学概念化需要被分析和纳入比较文学的批评讨论之中。艾伦认为文学体现了某些阅读实践, 这些实践产生于一定的文化和制度背景下, 摆出标准现代和文学的姿态, 把那些不按照他们的学科范式进行阅读的人视为非现代和非文学的。

英语世界的文学试图把所有文学传统纳入到一个单一的“等值评估层”(穆夫蒂 145)。为了挑战这种冲动, 重要的是揭露其殖民偏狭(艾哈穆德), 分析它如何以一种“规训的阅读方式”(艾伦), 或流动/非流动的“边界机制”(穆夫蒂)进行运作, 以及认清并非所有现代文学概念化都具有同样的知识和历史谱系。但这种方法也有其局限: 它冒着只阅读英语文本的风险, 即使我们阅读的目的是为了忘却它们的全球主导地位。这篇文章并未重构或是重读世界文学中公认的思想家们——如卡萨诺瓦(Pascale Casanova)、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萨义德(Edward Said)等人物——或是诸如琼斯爵士一类的欧洲殖民地学者。它主要(如果并非专门地)聚焦于 20 世纪早期伊朗和阿富汗的一代学者们, 他们在比较文学领域基本上是默默无闻的。不过即使在波斯和伊朗研究领域, 这之中的大多数学者仍值得批评界的重新引介。这代学者创造性地建立了一种新的文学话语。从伊斯坦布尔到喀布尔再到德黑兰, 他们使之成为制度上可考并具有文化权威性的话语, 本项研究即寻求将此种创造性去边缘化。

现有研究倾向于追溯欧洲文学话语的兴起如何改变了我们对东方文学文化的理解(艾哈穆德和穆夫蒂), 或者这种话语如何以多样的方式被东方文学传统所接纳和应用(艾伦)。他们出色地概述了介于文学作为一种概念范畴, 东方主义作为一种知识生产模式, 与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政治话语和过程之间的复杂性和共生关系; 更为少见的是他们概括了处于同一个语言共同体的两个非欧洲国家(伊朗和阿富汗), 是如何接受和采用一种欧洲文学话语的。

比较文学需要在“东方-东方”的文学联系之处进行更多的研究。本文旨在阐述伊朗与阿富汗得以对话的几个原因。在伊朗和阿富汗, 将文学打成一个学科的运动遵循了相似的时间线。虽然伊朗的印刷文化发展更快, 国家的管控制度较阿富汗更宽松, 两个国家却在同一时期开启了文学的制度化(Vejdani 257-61)。伊朗报纸《教育》(*Tarbiyat*)对何为文学与为何文学在 18 世纪 90 年代末对国家具有重要意义下了一个清晰的定义, 而对于阿富汗文学最为清晰的

表达则出现于 20 世纪最初十余年的喀布尔《灯报》(*Ser ā jol-Akhab ā r*) 中。作为文学作品和文学交流实验室的文学协会出现于 20 世纪最初十余年的伊朗和 20 世纪 30 年代的阿富汗。德黑兰大学在 1935 年建立了文学系, 喀布尔大学则在 1944 年。这个时间线显示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伊朗和阿富汗的兴起循着一个跨区域模式。在别处这种发展则沿着一个不同的时间线。例如在英属印度, 文学协会的出现可追溯到 19 世纪中期, 而加尔各答亚洲协会则是 18 世纪末期建立的。

公认的看法是伊朗和阿富汗民族文化的创建主要通过与欧洲知识模式的接触而发生。对许多研究者而言, 民族国家是“研究的基本单位和作为社会‘容器’的一个区域整体”(Conrad 3)。近年来, 随着伊朗和阿富汗民族主义的兴起, 殖民地印度、奥斯曼和土耳其共和国的作用被辩证地加以审视。本文通过恢复伊朗和阿富汗民族史上的一个重要篇章对以上研究加以整合。文章显示, 在伊朗和阿富汗向欧洲寻求文化灵感来源的共同背景下, 它们彼此间是怎样对话的。

在 20 世纪 20 至 60 年代, 伊朗和阿富汗人开始将波斯文学民族化, 并在文学协会、语言研究院和文学院的框架下将其制度化。不过假定他们之间的联系会因民族主义而切断或减少将是错误的。乌塔斯(Bo Utas)认为随着民族主义的兴起, “可以说, 现代阿富汗, 塔吉克斯坦, 巴基斯坦和印度的波斯语文学成为了孤儿, 而伊朗文化领域内的非波斯语文学, 诸如库尔德语文学和俾路支文学则变得无家可归”(225)。乌塔斯关于民族主义的论断影响广泛, 暗示着如果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的波斯语文学想要被经典化, 则需在伊朗或由伊朗人进行阅读和评价。将巴基斯坦和印度纳入此论断内则需要说明: 在它们那里, 波斯文学和波斯学的来世呈现出全然不同的情形, 因为巴基斯坦和印度并非也从来不是波斯语社会。不过主要的假设是清晰的: 民族主义已使这些波斯语社会彼此隔绝, 授予伊朗对 20 世纪波斯文学命运的唯一监护权(借用乌塔斯的比喻)。

我证明了全国性的文学生产场所实际上加强了波斯语国家间的联系, 并由此打开了本不畅通的探寻与交流渠道。伊朗和阿富汗人不仅关注波斯学和伊斯兰学的世界, 在 20 世纪早期他们还与使用英语、德语、法语、俄语、乌尔都语, 以及其他语言写作的学者相接触, 分析、探讨和辩论他们所共有的文学遗产的历史动力。德黑兰、赫拉特、喀布尔和伊斯法罕等城市的文学协会在伊朗和阿富汗学者间建立了更强的联络, 也将他们与在第比利斯、柏林、伊斯坦布尔、英国和德里写作的波斯语同行联系起来。实际上, 将阿富汗和伊朗的学术根源结合起来研究是必要的, 以便在互相连通的印刷和民族文化时代充分掌握波斯学、东方主义和民族主义史学的更广阔世界。正如贾巴里(Alexander Jabbari)提醒我们的, 这主要是因为通过一套共有的惯例与技术, “波斯世界的人们(以及地球的其他地区)经历了现代化”(20)。

伊朗和阿富汗人创造新文学话语的过程不仅有关他们之间的持续对话, 也有关他们之间的融合。20 世纪早期德黑兰和喀布尔的文学学者经常互相引用、评论, 甚至将彼此的作品在各自的期刊上进行再刊登。喀布尔大学有来自伊朗的留学生、教师和演讲嘉宾, 伊朗亦然。

伊朗人和阿富汗人经常互相拜访和通信,有时也会创作歌颂友谊的诗歌,以显示他们在语言和文化上的亲近。这一时期对波斯文学的民族化不仅是将其划归为伊朗或是阿富汗的文化遗产,也关乎波斯学和文学生产必然超越政治边界的认识;但是这种认识并不意味着伊朗和阿富汗对一切事物都所见略同。事实上,竞争是它们文学联系的一个主要部分,但是两方的学术课题竞赛必然意味着对彼此的智力成果和文学生产进行批判。

当然,这篇文章在本质上是说明性的,虽然还谈不上详尽。但是我希望它阐明了探讨“东方-东方”间文学联系会如何帮助我们扭转一种被动的句法(据此一套现代文学话语被伊朗和阿富汗人所采用);相反,本文将 adabiyāt 的兴起重构为对波斯文学传统的主动重写。通过建立文学机构,20世纪早期的伊朗和阿富汗学者们创造出一种把人、方法和文本联结起来的网络。文学变成了一项民族事业,一代又一代的研究者凭此实现了社会流动,在 adabiyāt 的世界中接受训练并继续训练下一代。在此历史过程中,为了将 adabiyāt 作为民族建构的话语来考察,伊朗和阿富汗人就如同需要他们的欧洲对话者一样需要彼此。

#### 注释 [ Note ]

[1] 本文译者系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在读博士生。

[2] See Terry Eagleton,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Blackwell Publishing, 1983; David R. Shumway, *Creating American Civilization: A Genea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As an Academic Discipline*. U of Minnesota P, 1994; Peter Widdowson, *Literature*. Routledge, 1999.

#### 引用文献 [ Works Cited ]

Ahmed, Siraj Dean. *Archaeology of Babel: The Colonial Foundation of the Humanities*. Stanford UP, 2017.

Allan, Michael. "How *Adab* Became Literary: Formalism, Orientalism, and the Institution of World Literature." *Journal of Arabic Literature*, no. 43, 2012, p. 176.

———. *In the Shadow of World Literature: Sites of Reading in Colonial Egypt*. Princeton UP, 2016.

Browne, Edward G. *A Literary History of Persia*. Scribner, 1902.

Conrad, Sebastian. *What is Global History?* Princeton UP, 2017.

Damrosch, David.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Princeton UP, 2003

Fani, Aria. "Iran's Literary Becoming: Zokā ol-Molk Foroughi and the Literary History That Wasn't." *Iran Namag: A Quarterly of Iranian Studies*, vol. 5, no. 3, 2020, pp. 114-44.

Jabbari, Alexander. *Late Persianate Literary Culture: Modernizing Conventions between Persian and Urdu*.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17.

Jones, Sir William. *The Collected Works of Sir William Jones*. Edited Garland Canon. 13 vols. New York UP, 1993.

Mufti, Aamir. *Forget English!: Orientalisms and World Literatures*. Harvard UP, 2016.

Utas Bo. "Genres in Persian Literature 900-1900." *Manuscript, Text and Literature: Collected Essays on Middle and New Persian Texts*, edited by Bo Utas, et al., Reichert, 2008, p. 225.

Vejdani, Farzin. "Afterword." *Afghan History Through Afghan Eyes*, edited by Nile Green, Oxford UP, 2015, pp. 257-61.

Widdowson, Peter. *Literature*. Routledge, 1999.